

《子夜》的艺术世界及周边问题

李城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系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 2011221026), 特此致谢!

《子夜》的艺术世界及周边问题

李城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子夜》的艺术世界及周边问题/李城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61-2953-1

I. ①子… II. ①李…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58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肖静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高 婷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5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曹顺庆

春节期间收到城希寄来的《〈子夜〉的艺术世界及周边问题》这部书稿，这是他在2009—2010年间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保生先生访学时所作研究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从书稿本身来看，城希收获颇大：

他在前言中全面讨论的是20世纪80—90年代持续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成就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而又极其复杂的反应，但时至今日关于这一问题或现象发生的原因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解释。应该说在80—90年代的知识分子领域，大家最为关切的是对刚刚结束的“文革”进行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反思，以期永远结束那种令人颤栗的生活与精神事件；同时更加急切地关注那些曾经在“文革”前后遭遇不幸，特别是“文革”结束后那些年事已高的知识分子何时能够平反，希望他们能在人生的最后时光看到戴在自己头上多年的沉重的“右派”等各式各样的帽子能够被摘下来，让他们看到历史的公正，曾经的痛苦得到些许补偿；再就是热切期盼改革开放的中国及其文化尽快走向世界。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人们急切地希望看到那些曾经因意识形态等因素干预而被有意排除在现代文学研究之外的现代作家如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能够尽快与读者见面以便给予他们公正的历史和艺术评价。就在这样的时代境域中，人们开始了对茅盾这样一位刚刚还享有盛誉的艺术家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这在当时或多或少让人感到意外。虽然人们料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以及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后会被重新思考和评价，但没有想到竟来得如此之快，引起的震荡如此之大。因此，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人们对茅盾及其小说特别是《子夜》艺术意义和价值的持续否

定值得深入思考，虽然当时也有一些相关的回答，但就事论事者居多，不足以解释否定茅盾及其小说艺术的深层动因。时隔多年，这一问题已被淡化甚至被人遗忘，但真正构成历史的那些人物和事件很难被真正淡化和遗忘，所谓淡化和遗忘只是被暂时搁置。此次城希从生活与艺术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认为80年代以来人们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否定固然有其艺术本身的问题，但要求茅盾与众多知识分子一道共同承担“文革”那样的时代带来的精神苦难可能是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深层原因。80年代以来否定茅盾小说艺术的意义与价值这一问题的原因当极其复杂，还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以供人们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纪进一步深入认识和讨论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子夜》艺术本身，城希首先提出了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群这一问题。他认为在典型理论支配下的长篇小说阅读存在严重局限性，一部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往往就等同于一两个所谓典型，事实是长篇小说乃至具有经典意义的中短篇小说如《阿Q正传》中的人物远不是一两个典型，而是由众多人物构成的不同形象群，不同形象群中各有其典型，正是形象群的存在构成了长篇小说内容及艺术的丰富性。就《子夜》而言，他认为其中至少有六大人物形象群，此外还有众多边缘人物同样富有审美意义，并对不同形象群的审美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与我们曾经的阅读感受形成了明显反差。

同时他还提出了长篇小说艺术的细节问题。细节不只是长篇小说阅读所要面对的问题，包括小说在内的全部艺术的审美意义无一不由细节生成，从诗歌中的意象到小说艺术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从戏剧中人物的一颦一笑到绘画中的一点一画，无数的细节实质上都构成了审美阅读的障碍，要解释其所蕴含的丰富审美意义从而消除阅读障碍可以说相当困难。城希在这里提出了《子夜》的艺术细节问题并对其作了较为深入的解释，这可以说是对长期以来学术研究追求所谓宏观认识的补正，严格说来这是关涉如何深入长篇小说艺术世界的问题。西方把细节的解读看作是小说艺术审美阅读的核心，对艺术作品细节的关注与深入的解读常常能够给人以豁然贯通的审美感受和认识，只有对细节作出深入合理的审美解释才能深刻感

受和体验小说艺术的魅力。顾彬 (Kubin, wolfgang) 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 “Good or Bad Literature”^① 这一问题, 它涵盖的内容似乎比经典更宽泛。就艺术而言, “Good Literature” 必有难解的艺术细节, 正是这样一些细节的存在让艺术充满永久的魅力。相反, “Bad Literature” 可能正是因为细节的消失。

在书稿中城希还提出了一个可以说相当重要但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好解释的问题, 这就是《子夜》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 实质就是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话语权的问题导致人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过程中一味强调新文学的存在意义及其合理性, 不是忽视而是有意回避通俗文学的巨大存在及其特殊审美意义, 回避新文学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样一来就如范伯群先生所说, 舍弃通俗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残缺的文学史。关于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虽然在 80 年代之后有所改观, 但触及核心问题的论述还不多见。城希在书中将《子夜》这样的新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直接联系在一起并用实证的方式指出《子夜》所受通俗文学的影响和表现, 这至少提醒我们对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的认识。通俗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发生与发展的重要背景和竞争对象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新文学作家可以说无一不受通俗文学和通俗艺术的影响, 其中鲁迅、胡适等人对通俗文学艺术价值有深入的研究和肯定, 茅盾、张爱玲等人明确表示对通俗文学重要作品艺术价值的认同, 他们的创作不可能不受通俗文学的影响。

最后, 书稿用了较大篇幅讨论 1949 年之后包括《子夜》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修改问题, 这一问题应该说至今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作品修改是一个复杂问题, 但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作品本身艺术的完善, 这通常是作家本人的自觉, 但也不可持续反复太久, 否则就会沦为美化个人早期艺术能力的行为。另一类则是如 1949 年之后在意识形态等因素作用下的非艺术修改, 这样的修改不在量而在质, 对作品本身原属 “点睛

^① Kubin, Wolfgang, “What is Good chinese? Towards the Problem of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Commonweal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比较文学: 东方与西方) Autumn/Winter 2011, No. 2, Vol. 15,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之笔”的修改会根本改变作品的艺术价值及读者的阅读感受和体验，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作品的影响就更加严重。如城希在书稿中所列举的这些作品，深信修改后与原作之间会存在根本距离，不仅极大扭曲了作家本人的最初审美创造意图，掩盖了作家的艺术才华，极大减损甚至从根本上消除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对作家本人的道德操守产生误解，原本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经修改之后就变成了先知式的为政治服务。同时，这样的修改不是面目全非而是天衣无缝，让人无法轻易察觉。因此，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其他重要文献的修改实在是构建了一部伪“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正是这样的伪“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成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也毫无疑问会失去历史的效用。这是在极力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急待解决的问题，也许如城希所说的那样，严格尊重历史，重版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的本来面目是未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以上是我对城希《〈子夜〉的艺术世界及周边问题》这部书稿阅读后的一些想法，相信他在本书的修改过程中会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认识，其中有些问题完全可以另行深入研究。

是为序。

2013年春，北京

序 二

王保生

大概是五年前，李城希来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进修。在此之前，他早已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接着又在四川大学师从曹顺庆教授读博士后，到厦门大学工作后，他仍然想进一步学习、充实自己。来到北京后，他想深入研究现代作家茅盾，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并不时髦的话题，他说，曾经读茅盾的小说很有兴味，但是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对茅盾代表作《子夜》的否定性意见，有的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重新排名，长期稳居“鲁郭茅”中第三的茅盾跌出了十名之外，对此他一直感到困惑不解。多少年过去了，这个疑问一直在他心中翻腾，他需要通过认真重读，通过相互交流，然后重评茅盾的《子夜》。李城希是个十分较真的青年学子，他做学问不随大流，不赶风潮，他要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钻研，求得自己能接受的答案。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通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它要求得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提出重写文学史，重读、重评中国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完全是时代的召唤。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形成，虽则也经过时代的淘洗，经过几十年读者的选择，也经过多种教科书的认定，但毕竟那是在比较僵化的思想统制之下，缺乏多元文化艺术选择的背景下产生，新的时代对之重新评价，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作为文学经典，它是不怕历代读者重读、重评的，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文学经典不是钦定的，更不是自封的，用行政命令，靠权力来树立经典，难以服众，也经不起历史考验；而

自吹自拉，自封经典，更是只能贻笑大方。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经典具有独创性、丰富性、深刻性、复杂性，甚至某种程度的暧昧性，也就是作者自己有时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秘意味。这些特性也就随着产生了对经典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谁也不可能穷尽或垄断对一部文学经典的阐释权。世界文学史上，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托尔斯泰，中国文学史上，《诗经》、《离骚》、唐诗、宋词、《红楼梦》，以及鲁迅的小说，也都是说不尽的，就是曹禺的《雷雨》这样的戏剧经典，直到今天学者、读者还是有着不同的解读，争鸣气氛不减当年。同样，古今中外，多少权威学者，多少领袖政要，对文学经典，对经典中的人物形象作过分析和评论，而他们的这些分析和评论本身也成了“经典”，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论述，关于巴尔扎克小说的论述，恩格斯从《城市姑娘》的评论中引出的关于“典型”的论述，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论述，毛泽东关于鲁迅的一系列论述，都成为后来者阅读和评论这些作家作品的指导思想，成了一种“经典话语”。但文学经典同时还具有另一种特质，即经典不是万古不变，它具有历史的流动性。人类社会要前进，名家名作代不乏人，各个不同时代需要不断地充实新的经典，同时也会逐渐淘汰过时的作家作品，包括曾经被认定为经典的作家作品以及所谓的“经典话语”，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

说到茅盾的《子夜》，20世纪80年代对它的一些否定性的意见，或提出一些质疑，这可以视为学术争鸣中的正常现象，特别是考虑到当时那种要求冲破长期封闭禁锢的思想解放的风潮，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仅是对茅盾的作品，鲁迅、郭沫若这两个被树为中国新文学主将的文化巨人，当时以及后来的一段时期，仍然有一些质疑其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声音。王朔就认为，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因此称不上伟大作家，对郭沫若的否定性评论就更多了，这些都应该视作学术争鸣中的一种表现。从积极方面来说，这些质疑，甚至否定性的意见，促使研究者对过去不能怀疑的所谓“定评”，对自己以往的阅读体会作一番重新考量，促使读者去重新阅读，推动研究者换一种角度来打量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往那种僵化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性解读已不适应新的时代，任何经典名著，都要经受新时代的重新认识、重新评判。从人类认识史角度看，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不是一

次完成的，它要经过多次反复地考察和检验，更何况文学经典，这种反映人类复杂心灵的艺术品，更需要经受历代读者的检验。当然，这种个人性的阅读，会有偏颇，或者矫枉过正，或者追求轰动效应，但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它能促进人们从更多的方面去思考，打破对权威评论、对教科书结论的习惯性依从，放出自己的眼光，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几年李城希一直在反复阅读《子夜》以及茅盾的其他著作，对相关的研究也多有关注，他曾写出《子夜》中人物形象群的研究论文，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如今他又在反复修改中，完成了这部书稿，这种执着进取的精神是十分可取的。我以为这部书稿的显著特色，是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是真正有感而为，有准备而发。《子夜》是一部十分丰富的存在，它在题材开拓、人物塑造、思想意蕴等方面，都有着可深入开掘的广阔天地。这部书稿不是面面俱到，泛泛而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子夜》的艺术世界的探读上。作者对《子夜》作了认真的文本细读，这在当前存在的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风气中，更显得难能可贵。正是通过认真地阅读，作者发现《子夜》具有多重审美的文化主题，它在30年代现代都市的背景下，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形形色色人的性格和命运，其中传统的历史性溃散、人性的堕落与蜕变、个人命运的无情改变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现代调整，没有答案的未来，构成《子夜》多重文化主题，《子夜》的审美意义也因此而变得极为丰富。人，活跃在30年代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大都会的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命运，他们在复杂矛盾的社会中如何生活，如何挣扎，才是作家茅盾关注的中心。茅盾首先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他要把笔墨伸向各色人等的内心，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他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因而研究《子夜》，首先要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分析活跃在长篇中的人物。书稿认为《子夜》全篇人物众多，不能简单地把之归纳为只塑造了吴荪甫、赵伯韬这样一两个“典型”，支撑《子夜》这样一幢艺术大厦的是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个“人物形象群”。这是从作品实际情况出发得出的认识，而不是对西方典型理论的简单套用。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群雄逐鹿，一两个典型人物无法支撑那样宏阔的征战场面，因而才有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

赵子龙、周瑜等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群出现；《水浒传》描写一百零八条好汉被逼上梁山，高举反抗义旗，武松、鲁智深、林冲、李逵、宋江等等，各有行动的故事，也各有鲜明的个性；《红楼梦》中除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以外，大观园中那些姑娘，不论其是贵族小姐，还是奴婢丫环，塑造得真是千姿百态。这些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早就昭示了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群是一个有效的艺术方法。李城希在本书中，对《子夜》中六个人物形象群的划分和分析，是入情人理的，是有说服力的。正是这六个人物形象群的成功塑造，建构了《子夜》这座很有光彩的艺术大厦。其中塑造最为成功的，当然是资本家这一形象群。这是以往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塑造得很少，也罕有成功的人物形象群。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在3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子夜》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民族资产阶级各色人物的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他们在30年代上海这一现代都市舞台上的生动演出，这无论从现代文学题材的开拓上来说，还是从人物形象丰富性上来说，都是很大的成功，与这一组形象对立的是初期工人运动领导者形象的塑造，早先有不少评论，认为这是茅盾的败笔，我觉得对这些也要作客观的具体的分析。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左倾的革命领导者却看不清形势，盲从共产国际的指令，一味地鼓动在城市里罢工，示威，那些冲在第一线的工人运动领导者，都是些缺乏斗争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子夜》描写他们的革命热情，同时也表现他们的内心苦闷，急躁盲动，甚至有些神经质，我认为这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正是因为革命者在当时的不成熟，才导致《子夜》对他们的描写的种种限制。如果《子夜》出现的是那些姓名都有些外国味的青年革命者，个个都是老练成熟，光彩夺人，那才是不真实的。

本书认为《子夜》的创作在某些方面借鉴了通俗文学的创作方法，初看感觉有些突兀，因为作者茅盾作为倡导者之一的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就明确地表示反对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但本书多方面的辨析，又使人觉得作者这一论点是有根据的，它开启了我们更深入探讨的思路。科学研究往往要从以往忽略的方面，甚至否定的方面，去发掘新的可能性。李城希从自己细心的重读中有所发现，彰显了学术探索的多种可能性。

五四新文学作者总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当年登高一呼，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打倒海淫海盗的鸳鸯蝴蝶派和陈腐的旧体诗词，新文学就一统天下了，其实即使到了30年代，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大都市，新文学也只是在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行，普通市民爱读的还是报章上连载的章回小说，爱听的还是评弹说唱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更不要说广大的农村，那儿基本上是通俗文学、通俗戏曲的天下。新文学作者是在通俗文学的土壤中生长的，在审美感知和表达方式上，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这是他们难以去除的胎记。尽管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会在公开场合高喊反对旧文学，看不起通俗文学，但在潜意识里，在情感的深层，这些传统文学的基因，却在不知不觉地左右着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写作方法，尽管他们口头上可能不会承认。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五四那么多新诗人，在另一场合，写起旧体诗词来是那么得心应手，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甚至包括鲁迅，他们创作的旧体诗词，至今还是一些学者研究的课题。书稿作者能从矛盾处发现问题，并尽量合理地来进行阐释，这就推动了《子夜》研究的深化。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点进步，每一点突破，都要花费巨大的劳动，都值得珍惜，因此，我很高兴推荐李城希这部书稿。

2013年新春，北京

目 录

序一	曹顺庆(1)
序二	王保生(1)
前言 在生活与艺术之间:一个时代的要求和误解	
——20世纪80—90年代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	
问题讨论	(1)
一 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多重时代及文化背景	(2)
二 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具体情形	(5)
三 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多重时代、艺术及 文化原因	(15)
四 我们今天如何重新面对茅盾构建的宏大小说艺术世界	(30)
第一章 形象群与多重文化主题:《子夜》的艺术世界	
一 多重文化主题与《子夜》审美意义的开放性	(37)
二 形象群与《子夜》中的人物形象构成	(56)
三 《子夜》中人物形象群的来源、塑造方法及艺术意义	(84)
第二章 细节及细小的问题:《子夜》的艺术世界	
一 长途旅行、都市污染与生活经验缺失:吴老太爷之死	(90)
二 同与异:吴老太爷与阿萱父子视野中的都市女性身体	(107)
三 欲望的世界与边界:《子夜》中交际花的身体表现方式及其 审美意义	(116)

第三章	通俗文学的影响及表现:《子夜》的艺术世界	(132)
一	才子佳人、黑幕与侦探:《子夜》与现代都市生活复杂性和隐秘性的审美表现	(135)
二	物化、游戏与被压抑、被损害背后的性泛滥:《子夜》中才子佳人之间关系的多重性及其审美意义	(164)
三	不只是雅与俗:《子夜》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间关系发生的原因及意义	(175)
第四章	困境及影响: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修改	
	——以茅盾及《子夜》为中心	(183)
一	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关注与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84)
二	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修改面临的多重困境	(187)
三	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修改困境形成的原因	(203)
四	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困境中修改的具体情形	(212)
五	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修改的性质及影响	(224)
参考文献		(230)
后记		(235)

前言 在生活与艺术之间：一个时代的要求和误解

——20 世纪 80—90 年代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问题讨论

如果不对新时期伊始即已发生并在 1988 年初明确表现出来且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冷峻否定这一重要现象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①，茅盾曾经构建的宏大小说艺术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就始终难以在这一否定的基础上再度确立；茅盾及其小说艺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支撑性结构与逻辑环节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就始终无法得到确认；人们对茅盾及其小说艺术世界关注和研究的热情就始终无从真正唤起，茅盾研究也因此难以在新的起点上深度展开。由此，茅盾丰富的思想、艺术与文化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以在新的时代推进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曾经发生的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外文学史所罕有，而且一开始就超越了茅盾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而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②，对茅盾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乃至当代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今距离最初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否定已过去近 30 年之久，新的世纪也已过去十年有余，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思想界无论是思想观念、理论视野还是思维空间与思维方式都已发生深刻变化，重新回到

① 注：之所以说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否定“新时期伊始即已发生”，这从蓝棣之等人的表达可以明显看出，“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我发现自己逐渐对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积累了一些看法”（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 年第 3 期）。事实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整体反思与重新评价在新时期伊始甚至在“文革”期间就已开始，新时期一到来即不断表现出来，包括茅盾及其小说艺术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如此。

② 钟桂松：《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0 页。

80年代之后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现场并与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学术研究相遇时有着强烈的隔世之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距离的不断拉开,曾经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否定这一已成历史的现象本身日益清晰;茅盾及其小说艺术世界日益摆脱曾经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与纠缠而不断成为纯粹的历史与审美对象;面对重要历史问题和现象时人们的心态与行为如今日渐理性持重;与茅盾及其所处时代完全没有照面,与茅盾所处时代已大不相同因而伦理、道德、情感与理性认识能够清晰分离开来的新一代研究主体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们对包括80年代之后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在内的重要问题与现象的认识会更加切近历史本身。

因此,很有必要也完全能够对曾经持续长达十年之久至今依然未得到合理解释的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这一现象发生的时代背景、具体情形及深层原因予以尽可能深入的认识和讨论,在全新的时代境域中重新唤起人们面对茅盾曾经构建的宏大小说艺术世界的热情从而重新认识茅盾小说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一 否定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多重时代及文化背景

1988年初开始明确表现出来的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持续否定这一问题和现象有着复杂的时代及文化背景,它与改革开放这一全新时代有关,更与茅盾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密切相关:

1.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不断分离。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否定这一现象的发生首先与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环境密切相关,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也不允许这一问题或现象发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学艺术领域开始不断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归自身,“几十年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现在看来也不够恰当,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不要再这样提”^①,也就是自上而下自觉终止或放弃意识形态对艺术和学术的直接干预。正是在这一重要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几乎将此前经历的所有重要问题和现象都置入理性世界予以重新审视,“新

^① 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5页。

时期十年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发生过一系列重要论争……涉及许多大是大非问题”^①，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否定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所谓“大是大非”实质上是那些原本纯属思想领域的问题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而政治化，由此，面对这些问题需要的不再是理性的深刻思考而是在拥护与反对之间必须作出选择，学术研究沦为政治表态，重新讨论这样一些所谓“大是大非”问题的实质是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分离与回归。对茅盾小说特别是《子夜》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否定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分离并回归自身的重要表现，“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我发现自己逐渐地对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积累了一些看法”^②，这里所说的“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实质是曾经被意识形态扭曲的文学观念的回归。

因此，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否定这一现象正是也只能是在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时代背景之下才得以发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关系开始分离的重要表现。

2. 外来文化影响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对茅盾小说艺术意义与价值的否定还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方式的转换密切相关，这特别表现在：首先，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不断引入直接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继五四之后再次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予以全面接受和运用，尽管这样的接受今天看来相当浮面甚至非常隔膜，但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文学研究思维方式与方法的根本转换。1985年3月、4月、10月在厦门、扬州、武汉分别召开了三次关于文学评论方法的大规模讨论会，不仅与会学者众多，而且每次会议都长达七八天之久^③，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变革产生了转折性影响，曾经的政治批评标准以及反映论思维方法被不断抛弃，文学研究不断回到文学本身，开始“1. 由外到内，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转移；2. 由一到多，从单一

① 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② 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③ 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